

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政策的沿革及伟大实践

李运祥

(武汉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系,湖北 武汉 430063)

摘要 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政策可以说是萌芽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并成熟于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制定的正确的科技政策都大大推动了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 科技政策 沿革 实践

中图分类号 F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48(2003)07-036-03

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为赢得新发展,不约而同地把竞争取胜的支点放在科学技术上,科技政策成为世界各国政府及领导人关注的重点问题之一,这充分证明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恩格斯曾经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科学是一种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毛泽东也十分重视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延安时期,毛泽东在自然科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中说:自然科学是很好的东西,它能解决衣、食、住、行等生活问题,每一个人都要研究自然科学。邓小平继承了毛泽东对科学技术性质的分析,认为科技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他说:“有些东西并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比如说,技术问题是科学,生产管理是科学,在任何社会,对任何国家都是有用的。我们学习先进的技术、先进的管理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而这些东西本身并没有阶级性。”2001年7月1日,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而且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的观点。

建国以来,党的科技政策可以说是萌芽于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形成并成熟于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集体。

1

新中国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科技政策的形成、发展及实践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中就明确指出:“努力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奖励科学的发现和发明,普及科学知识。”中国共产党也适时地将工作重点转向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开始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艰难探索。一方面建立和完善新的生产关系,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另一方面全面开展经济建设,努力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不但要把一个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中国,变为一个政治上自由和经济上繁荣的中国,而且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对原有的研究机构进行了调整、改组,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及其所属机构。1949年11月1日,成立了中国科学院,归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直接领导,郭沫若任院长,这就奠定了国家科学研究体制的基础。中国科学院组建初期辖有14个研究所、1个天文台、1个工业实验馆。1949年底,郭沫若院长访问苏联科学院,了解苏联科学院的建制情况,这些对中国科学院组织机构的建立有很大帮助。

1950年8月,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会上产生了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与中华全国科学技术知识普及协会,吴玉章为两个委员会名誉主席。1955年6月1日,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在北京开幕,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

对大会作了重要指示。通过这次大会,中国科学院正式成立了四个学部,即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理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哲学社会科学部。到1955年底,我国以苏联为榜样,初步建立了以科学院为中心、以政府各部门和高校科研机构为辅助的科技新体制。到上世纪50年代中期,全国科学技术人员已增加到40多万人,比1947年增加了8倍;科研机构发展到840多个,比1947年增加了20倍。1956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在新中国科技政策史上的地位是重要而且影响深远的。正是在这一年,党中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

1956年前后,世界新科技革命已现端倪,威力日显。周恩来在1956年初指出:“世界科学在最近二三十年中,有了特别巨大的迅速的进步,这些进步把我们抛在科学发展的后面很远。”“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是周恩来在全国知识分子会议上首先提出的。1956年1月14~20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报告》,毛泽东最后作了重要讲话。周恩来的报告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时期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一个历史性的文献,也是加强科学技术力量的一个政策性的号召,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了“向现代科学进军。”

会议结束不久,1956年2月24日,根据周恩来的报告和毛泽东的讲话,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

收稿日期:2003-04-22

示》，重复和肯定了知识分子会议的正确估计与决策。中央确定由周恩来亲自挂帅领导这项工作，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规划工作，陈毅任主任，党中央调集了600名各门类和学科的国内专家和近百名苏联专家参与编制规划。1956年12月下旬完成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中共中央立即转发各地各部门征求意见，至此制定规划的工作全部完成。

第一个全国科技规划是宏伟的，也是切实可行的，它体现了中央和国务院发展科学技术的方针政策，成为全国人民向科学进军的行动纲领。自1957年规划开始顺利实施。1958年，科学规划委员会向中央递交科技发展规划检查报告时，提出争取提前5年，在1962年完成规划的目标。1962年底，国家对规划的执行情况进行了全面检查，绝大多数科研项目已经完成，我国整体的科技发展，7年时间完成了十几年的工作量；全国科研机构从1956年的381个增加到1296个，科技人员由6.2万人增加到1962年的近20万人。以“两弹一星”的成功试爆试射为标志，规划对中国国防事业的飞跃发展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大大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12年科技规划基本提前5年完成，大体上达到世界先进国家三四十年代的水平。在此基础上，又制定了《1963~1972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1963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原则批准了这个规划。

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会议讨论了这个报告，并首次提出了符合科学与文化发展规律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1956年3月，国务院成立了科学规划委员会，负责科学规划工作。同年6月，又成立了国家技术委员会，组织全国技术工作。1957年5月12日，国务院确定科学规划委员会是掌管全国科学事业方针、政策、计划和重大措施的领导机关。1958年11月，国家技术委员会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合并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委员会（简称国家科委），聂荣臻副总理兼任主任，国家科委成为主管全国科学技术方针政策的职能机构。

在1957年反右斗争扩大化和1958年“大跃进”的过程中，中国科技政策也出现了暂时的偏差，科技工作受到了相当大的挫

折。

党中央和毛泽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决心扭转不利的局面。全国第一个出现的政策性文件是“农业六十条”，第二个是“科学十四条”，此后，工业、教育等各条战线也相继制定了各自的政策性文件。“科学十四条”是科技领域贯彻执行调整方针的重要文件，当时被誉为“科学宪法”。1966年底，分管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先后到导弹研究院和中国科学院作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主持了文件的起草工作。1961年7月6日，在刘少奇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科研工作十四条》和聂荣臻的报告。毛泽东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会后他批准下发了这两个文件，引起了很大震动，反应十分强烈，科学界表示欢迎，积极性普遍提高。《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实施，还未从根本上纠正前段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错误，即对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基本估计，以解决知识分子的归属问题。1962年2月16~3月12日，聂荣臻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同年3月2日，周恩来也向广州代表做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

《科研工作十四条》的制定和实施，广州会议的召开，一系列科技条例的制定，使科技界“左”的干扰和束缚减少了，科技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①端正、健全了党的科技政策，到1964年可以说已经具备了比较完整具体的政策，基本走上了符合我国国情的轨道。②整顿了队伍和科研秩序，至1962年底，经过调整，全国省、市以上的研究机构由1300多个调整为700多个；全国科研机构的总人数由1960年的25万人，精简为19万人左右。③科学技术成就显著。大庆油田的发现和开发，矮秆水稻的培养成功和大面积推广，胰岛素的首次人工合成，特别是原子弹的爆炸成功，集中反映了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同时，中国有了一支比较强大的科研队伍，到1965年底，全国科技人员已达245.8万人，专门的科学研究机构达到1714个，人员达到12万人。④增强了全党的科技意识，教育了干部。⑤这一时期科技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的调整，为以后尤其是“文革”结束后的拨乱反正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1966~1976年，我国经历了一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整个国家和民族遭受了一场历史上罕见的浩劫，而科技、教育战

线又是公认的“文革”重灾区。1966年6月，聂荣臻与有关方面一起研究起草了《关于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待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几个政策界限》的初稿。文件遭到“中央文革”的强烈反对。党的科技政策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扭曲：一是所谓“两方向”、“三结合”的无产阶级科研路线；二是鼓吹用突出政治来坚持科学研究的“正确方向”；三是要求实行“开门办科研”，大搞群众运动；四是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及“反动”学术观点；五是反对学习外国的“赶超”政策。在极“左”的科技政策指导下，科研机构被肢解甚至解散，大批科技人员遭受打击和批判。科技人员失去了从事科技开发应有的环境和条件，科技队伍青黄不接。国际科技交流活动几乎全部中断，拉大了与发达国家先进科技水平的差距。

1975年，邓小平主持整顿，指出科技人员“九年无宁日”，对他们“欠账太多”，强调“要发挥科技人员的积极性”，“要给他们创造比较好的条件，使他们能够专心致志地研究一些东西”。邓小平等人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取得一定成效，这在国防科研事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2

1977年1月16日，《光明日报》发表教育部大批判文章《一场围绕自然科学基础理论问题的政治斗争》。邓小平仔细听取了与会科学家和教授们的意见，8月8日上午，就17年的估计和调动积极性问题，发表了《关于科学和教育工作的几点意见》的讲话，这个“大胆的讲话”，成为科技和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的“宣言书”，标志着科教政策实际转折的开始。1977年9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召开全国科学大会的通知》，1978年春天在北京召开全国科学大会，会后科技战线开始制定拨乱反正的政策。①平反冤假错案。据23个省、市、自治区的不完全统计，仅1979年、1980年两年，得到平反昭雪的冤案中涉及科技人员的案件即达73339起。②恢复科技管理机构。1979年10月6日又成立了科学研究协调委员会，由聂荣臻任书记。1979年12月20日，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成立。③加强科技队伍建设。包括恢复高考；恢复研究生制度；制定新时期留学政策。④认真落实知识分子政策。1979年11月3

日,中央组织部正式发出《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几点意见》。1983年12月18日,国务院批准了国家科委《汇报提纲》。1985年,中共中央宣布:到1987年党的十三大以前,必须完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任务。⑤扭转轻视科学技术的社会风尚。198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批转国家科委党组的《汇报提纲》的通知中说:“30多年来我们吃不重视科学技术的亏是不不少的”。在党中央的示范和新闻宣传的正确引导下,整个社会学习科学文化、尊重科学蔚然成风。1980年,取得重大科技成果2600多项,经国家批准的创造发明107项;1981年,重大科技成果和创造发明3100多项和120项。拨乱反正完成后,新时期全面系统的科技政策已是呼之欲出了。1980年,邓小平在听取国家科委的工作汇报时,提出必须把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和科技发展计划结合起来。1980年12月25日至1981年1月5日,国家科委主持召开了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1981年2月23日,国家科委党组在给中央的《关于我国科学技术发展方针的汇报提纲》中着重汇报了这一新方针。1981年4月,国务院针对科技发展与发展经济存在严重脱节的情况强调指出,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为发展经济服务。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报告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把发展科学技术列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1988年9月5日和12日,邓小平在同外宾和国务院的人员谈话中说:“马克思说过,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事实证明这话讲得很对,依我看,现在这样说还不够,科学技术恐怕是第一生产力。”1992年春,他在南方谈话中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1989年12月19日,江泽民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说:“要坚持科学技术工作面向经济建设、经济建设依靠科学技术的战略方针。”199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并召开了全国科技大会。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第一次把“科教兴国”作为我国的战略方针并写进入中央文件。1996年,成立了以时任总理的李鹏为组长的国家科技领导小组,职责是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而研究、制定国家科技政策,讨论、决定重大科技项目。1997年9月,在党的“十

五大”报告中,江泽民提出把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国家发展战略。1998年2月,江泽民就中科院《迎接知识经济时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的报告作了重要批示。同年5月4日,江泽民在庆祝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再次发出了科教兴国的动员令。同年6月9日,由朱镕基任组长的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举行首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科学创新工程试点的汇报提纲。到2001年,国家科技教育领导小组先后召开了七次会议,对科技教育领域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决策,先后制定了《八年科学规划》、《技术政策蓝皮书》、《1986~2000年中国科学技术发展长远规划》。

1986年,国家将全国科技工作部署为面向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服务、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加强基础性研究三个层次。其中,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是科技工作的主战场,发展高新技术及其产业和加强基础性研究是主战场的两翼。

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主战场中,科技贡献功不可没,解决了国民经济建设中的一大批关键技术问题,推动了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在科技兴农,推进农村和农业科技进步方面,1985年中央批准制定了“星火计划”。这是面向农村的科技计划,是科技发展战略的一项重要举措。20世纪90年代,国家继续推动是“星火计划”上新台阶,以“西部拓展、中部燎原、东部升华”的总体发展战略推进。科技兴工,推进产业技术进步,我国工业发展正在进入提高增长质量和效益的关键时期,根本途径在于推进科技进步,促进企业成为技术开发的主体。1995年,“清华大学与企业合作委员会”宣告成立,这是全国首次在校成立的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组织机构。推动社会发展领域的科技进步,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跨世纪的发展战略,我国政府于1994年正式推出了《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白皮书》,它标志着我国正式开始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在发展高技术研究方面,国家实施了著名的“863”计划,由于催化计划产生的建议的提出和邓小平的批示都是在1986年3月发生的,这个由科学家和政治家联手推出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被称作“863”计划。

“863”计划取得了累累硕果。截止1995年底,共取得研究成果1398项,占全部选定课题的59%。其中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有550项,进入应用领域的有475项。“863”计划吹响了新中国第二次高科技战役的号角。

旨在推进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火炬计划”是1988年问世的,其主旨在于高新技术的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1994年底,地方项目4750项,累计实现新增工业产值1427亿元,利税244亿元。到20世纪90年代后,“火炬计划”逐步走向成熟。

建国以来,在党的科技政策指引下,我国科学技术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科技体系,拥有一支庞大的科技队伍,在少数领域已接近世界先进水平。但总体看来,我国科技水平仍很低,与发达国家差距较大。21世纪是关键时期,我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抓住机遇,就将实现我国人民多年来强国富国的梦想;迎接挑战,要在激烈的世界科技和经济竞争中大力推进科教兴国的步伐。党中央已经制定了新世纪正确的科技政策,提出了切实可行的科技发展步骤,我国有信心、有能力实现中华民族科技的新辉煌。中国应该成为世界科技大国和科技强国,这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题中应有之义。

参考文献

- 1 崔禄春,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科技政策研究[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慧 超)

